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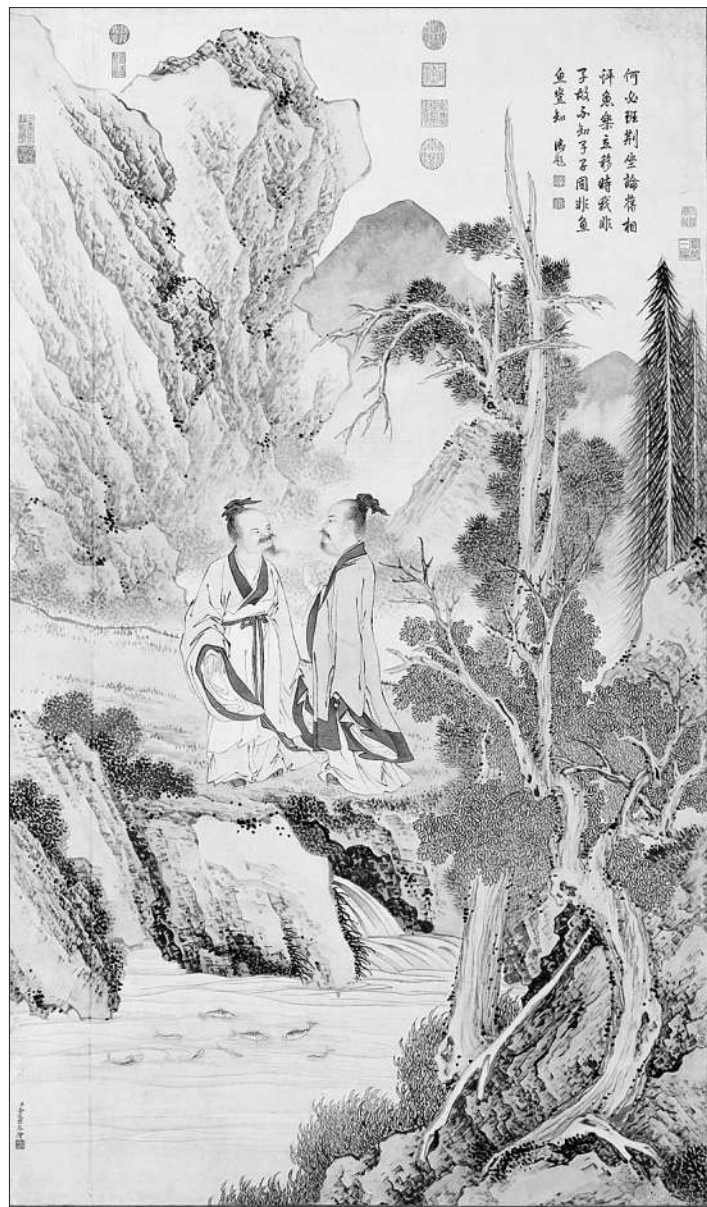
光明书话

“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

——《庄子内篇释义》以哲人释哲学

□ 陈赟

与当下众多版本的《庄子》相比,杨国荣先生《庄子内篇释义》(中华书局2021年版,以下简称《释义》)提供了一个别具一格的《庄子》解读版本,其特点是以哲学的方式让《庄子》说哲学。《庄子》采用了寓言、重言与卮言的言说方式,既内涵“诗意地说”,也包括“叙事地说”,但在这个“世界图像”(即世界通过世界观而呈现自身)的现时代,这两种言说方式都已经无法满足于人们业已理性化的心智与精神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让《庄子》说哲学就显得特别重要,“说哲学”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所说是哲学,二是以哲学的方式说,两者结合就是以哲学的方式说哲学。它是在普遍性的哲学义理层面提炼并推进对《庄子》的哲学化理解,并将这种理解引入到现代哲学的智识背景中,这意味着,不是《庄子》文本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本来意思,而是它对干现代时代我们的意义,构成《释义》的关切所在。以“内容”与“方式”的双重哲学化视角切入《庄子》,之所以困难与稀少,乃是因为它要求从事这种活动的作者本身是哲学家,唯有在哲学家那里,经典文本的诠释本身才是一种哲学活动本身。本书作者是当代有影响力的哲学家,有“具体形而上学”的系统性理论建构,从哲学理论高度诠释《庄子》,相对于从训诂至辞章再至义理的“自下而上”进路,本身就是一种“高屋建瓴”的方式——毕竟唯有哲人才能真正理解哲学,而以哲学家身份展开的《庄子》诠释方式本身,也同时是哲学的展开方式。这一点显然构成了《释义》最突出的特点。



庄子和惠子游于濠梁之上,见白鲩鱼出游从容,因辩论是否知鱼之乐,后遂用“濠梁观鱼、濠上观鱼”等表示逍遥游乐。

清·金廷标《濠梁图》 资料图片

化“诗意地说”“叙事地说”为“逻辑地说”

在《释义》看来,哲学家说哲学的方式有多种,包括“诗意地说”(以形象性的描述和隐喻的方式言说)、“批判地说”(侧重对现实的批判性考察)、“思辨地说”(注重形式或超验的维度)、“逻辑地说”(关注形式层面的逻辑分析)。“作为哲学家的庄子既善于诗意地说,也擅长叙事地说,通过对人物的形象描述以表达某种观念,并提出内在的哲学问题”,有时“诗意地说和思辨地说往往结合在一起”,这使得《庄子》的思想“既有思辨的构造,又充满了想象和隐喻,二者的交错构成了其言说方式上的个性特点”。这是《释义》对《庄子》言说方式的把握。庄子曾自叙其言说方式为“三言”(卮言、重言、寓言),卮言是对象之变化而随之变化的言说方式,它防御的是凝固化与教义化的言说;寓言则是借此喻彼的间接性言说方式;而重言严格意义上可以

理解为多重视角的复调交响式言说方式。《庄子》“三言”可有两种理解:一是以寓言为首,强调整个《庄子》言说的隐喻性质,一是以卮言为主,强调言说自身的流动性以及随言说内容而采用相应言说方式的灵活性。“诗意地说”与“叙事地说”则是现代哲学语境对《庄子》言说方式的概括。“诗意地说”强调想象力、审美与象征等方式对言说的渗透,而“叙事地说”则聚焦于讲故事的方式,来阐发哲学的义理。无论是“诗意地说”,还是“叙事地说”,都不是立足于概念的论证性言说。而此书与众不同的特色就是发掘或重构《庄子》的哲学性:一方面要实现一种转化,化《庄子》自身的言说方式为“逻辑地说”;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义理之逻辑重建方式突显《庄子》哲学的论辩特征。

“听”的三层次,即“听之以耳”“听之以心”“听之以气”,在作者这里则被转换为把握世界的感性化、理性化、直觉化三种方式。对于《庄子》思想中的“命”,作者提炼出两方面的含义:从最一般意义上它表现为某种必然趋向,人力无法改变;另一方面,“命”被视为与适然、包含偶然之意。而必然与适然,都与自然相合。《庄子》一再强调的“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被解读为以顺乎必然为指向,同时又安于适然、合于自然。对于《庄子》哲学中的“自然”,《释义》一针见血地点出其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内在自然,即人的天性;未经文明改造的本然之性,一是外在自然,即尚未人化的本然世界,进而对于《庄子》具有归宿意义的“逍遥”之本质概括为顺乎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即自由与自然的合一。

唐代“书手”:盛世时代的记录者

□ 张安福

中国有着悠久的书写历史,在印刷不发达、无法大规模机械复制的古代,书写、抄写工作作为传承文明、记录史的重要职业。而“书手”,作为担任书写、抄写工作的专职人员,其群体也逐渐趋于定型。目前所能见到的早期书手文书本当然是出土于敦煌和罗布泊的纸质文书,如斯坦因发现的粟特人文书、日本大谷探险队发现的“李柏文书”等,都是魏晋时期的作品,从这些出土文书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书法的变化,也可以初步看出古代书手工作的端倪。而真正将书手作为一门职业定型并记录下来,是在宋元之际,如《辍耕录》中写道:“世称乡胥为书手。”

“书手”这一职业和群体的存在,为我们记录下了唐代的盛世局面,也可以窥见大量社会基层民众的生活场景。我们可以从多学科

对其进行研究,如书法形式、艺术体现、社会表达方式等。遗憾的是,学界的唐代研究成果较少涉及这一领域,所以,即使现在治唐史的学者,也有很多人对此感到陌生。近期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侃博士的《唐代书手研究》一书,为学界展示了中国古代文书,尤其是唐代书手研究的成果。该成果以大量的敦煌文书和唐代墓志为基础材料,以书手的身分、职业为切入点,分别对唐代书手的身分职业、土履与生活、教育与艺术三个主题进行了研究,厘清了唐代书手的多重身份和职业的社会变迁轨迹,并考补了六位书手的身分及其社会生平,从地域空间、时代互动等方面探讨了书手的个体技能和整体职业素养、师承关系与时代书风等,解决了唐代书手的身分构成、工作场域、经济生活等问题。

从唐代墓志书下来研究书手的书法是该著述的重点内容,借助于出土文书、墓志、碑刻等文献,更能精确地再现书手的工作职能和艺术水平。同时,作者认为唐代书手对于唐代图书缮写与传播、文献校勘、书法史的研究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和作用。这些认识非常到位,我们认为,这些书手不仅是庙堂之上的国事记录者,也是江湖边缘的社会书写者,他们记录着时代,刻画着历史。

《唐代书手研究》作为研究唐代书手的拓荒之作,正如该著作前言中傅永聚先生所言,该书“首次全面呈现了唐代无数不知名书手的生存状态和书法风貌,包括给书手”这一名词合适的界定,并具体指出其涵盖范围,有利于全面总结唐代书手与书法和文化的关系,为全面研究唐代书法与社会的

儒道比较与思史合一的深层视野

儒道的差别被引入对《庄子》的诠释中,二者分别被提炼为仁道原则(侧重历史文化的创造与文明的延续)与自然原则(侧重反文明或前文明的原始混沌或本源的统一性)。与此相应的是儒家对理性的突显和《庄子》对直觉的强调。儒家强调调类的延续,个体融入历史过程中的文化创造,强调社会性与人道的价值,而《庄子》则侧重生命的自然延续,突显对人间价值的超越。儒家以“事”解“物”,“事”表现为人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之所“为”或人之所“作”,以“事”解“物”意味着将自然之物纳入人文之“事”的过程中,即所谓自然的人化。但道家则反对人为之“事”作用于自然之“物”,不以人的活动取代作为自然对象之物,突显的是顺乎自然,不以物为

事。学以成人是儒家思想关注的重要内容,“学”与世间人伦价值密切相关,但《庄子》所理解的学主要是顺乎自然、合乎天性。儒家所理解的德,是社会规范以及社会性的价值系统,而《庄子》之德则以合乎自然为实质内容。

不难看到,儒道分辨构成了本书的深层视野。儒道两家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两种思想形态,借此两种思想形态的深层比较来诠释《庄子》,这本身已经体现了思史合一的视野,后者展现为即哲学以说哲学,即哲学史以阐发哲学。以这种方式,《庄子》的某些思想与观念,可以在哲学的历史展开与不同类型形式中得以定位,从而赋予思想本身以义理上的脉络性,以突显思与史的互动与交渗。

以哲学解哲学的平视方式

哲学文本的阐释本身有多种方式,而不同的态度关联着不同的介入方式。以信仰的方式去诠释本文,意味着“仰视”,此方式虽然内涵对文本的尊重,但同时也将携带教条化理解。另一种理解方式可以称为“俯视”,即将文本作为进化链条上的传统环节,古典文本的阐释活动本身成为确定现代人的材料,这种理解从本质上消解了经典阐释的意义。与此不同,《释义》采用的是以哲学家理解哲学文本的“平视”方式,直面哲学文本本身,正者还其为正,非者归其为非,使之各得其所,这本身就是一种辩证法的“综观”视野。

基于“平视”的切入方式,《释义》呈现了《庄子》哲学中少有人注意的层面,譬如发现了“有道”与“无道”的不同,唯有化道为德,才能成就主体的精神修养,而修养的过程就是内在的“合乎道”,转化为内在于个体的“德”的过程。平视的另一面则是批判与检讨。庄子并不是神,而是有血有肉的具体个人,他在有所见的同时也就不能不有所见。《释义》在讨论《庄子》对“用”的理解时,肯定了《庄子》对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的区分,无用于外物者而往往有用用于自

身,因此《庄子》之所见在于对内在价值表达了肯定。然而,《释义》同时告诉我们,《庄子》过于强调无用之用与内在价值,而忽略人的能力和创造性,后者均属于外在之用,这导致了《庄子》对用与无用的看法过于消极。《释义》看到,《庄子》对文化与文明的正面价值未能给予充分关注,对人的目的性活动及其意义,缺乏适当的定位。《庄子》基于原始思维的设定,而不是根植于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发展过程中生产的普遍性。

综上所述,杨国荣先生的《释义》作为以哲学家解释哲学文本的作品,具有显著的哲学特色,它本身就是哲学的展开,这使其对文本达到更具有本质性的观看。《庄子》一方面说“且有真人而后有真知”,这意味着唯有哲人才能理解哲学,另一方面又有“知音其难”的慨叹:“万世之后而一遇大至,知其解者,且且暮遇之也”。作为哲学家的庄子似乎在热切期盼与千年之后的哲学家对话。而《释义》一书不就是这样一种发生在哲学家与哲学家之间的对话吗?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

近日,德国著名哲学史家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汉译多卷本由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这一300余万言的学术巨著甫一亮相,便引起了国内学界的重视,被认为是近几年来国内译介国外经典学术著作的一个重要成果。我作为这部汉译多卷本学术巨著翻译团队的主编,在这套书与广大读者见面之际,关于策勒和他的《古希腊哲学史》的确有一些想说的话。

十九世纪是历史主义兴起和兴盛的时代,十九世纪的德国则是其中最耀眼的时代,不仅孕育出了历史主义的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成果——黑格尔哲学和黑格尔主义,而且涌现出了众多史学级的学术成果,绚烂夺目,宛若璀璨的星丛。在这之中,一颗最耀眼的星座,就是爱德华·戈特洛布·策勒的多卷本《古希腊哲学史》。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是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史编纂”的黄金时代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不仅与它同期的作品无出其右者,而且之后的作品也鲜有与其匹敌者。

策勒1814年1月22日出生于德国符腾堡的小波特瓦,早年在图宾根大学期间即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要成员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结识,接受了其历史和神学批判的思想,由此开始了他作为一位黑格尔主义者的哲学活动。但是,策勒并不是以一位历史主义的思想家的面目出现的,而是以一位历史主义的实践家的形象将自己的名字牢牢地树立在了现代学术史上。在这之中,给他带来最佳声誉的就是《古希腊哲学史》这部多卷本的哲学史代史巨著。与他同期的德国哲学史家文德尔班曾经将它评价为“古代哲学的终结篇”,“建立在最广泛的语文学-历史学研究的基础上,使用原始材料,在哲学史的整个演变方面给出了哲学性、权威性和富有启发的论断”,认为十九世纪的同类型作品与之相比“都显得黯然失色”。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原标题为“在其历史发展中的古希腊哲学”,初版写于1844-1852年期间,分为3卷,之后历经策勒生前和身后长达70余年的多次修订,最终形成了德文版三大卷六册的格局。中文版所依据的是其英文版,分为六大卷八册。

作为古希腊哲学史学科的扛鼎之作,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具有多重奠基性的学术价值。择其要者而论,有以下三个方面,即科学的方法论的示范,古希腊哲学基本历史分期确立,和古希腊哲学学派的书写。

策勒所处的时代是黑格尔的思辨的历史观盛行的时代,人们所熟知的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思想即是其体现。它不仅要求赋予历史以逻辑,而且还要逻辑先行于历史,以体系化的方式来构造历史。黑格尔自己的《哲学史讲演录》即是这一历史观、方法论运用于哲学史研究的经典体现。策勒深受黑格尔主义的思想影响,但是在学术思想上却能保持方法论上的独立性,明确反对这种逻辑先行于历史的先验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体现在多卷本《古希腊哲学史》的撰写上,策勒坚持了历史研究最基本的科学原则,即论从史出,实事求是。他不反对从历史遗留的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材料中发现其内在的思想逻辑,甚至体系,却反复强调所有这些针对古代哲学家的理论建构都必须严格限制在材料所能提供的证据支持的范围内。这样,策勒便使得他的研究观点建立在充分的材料证据的基础上。文献的丰富,证据的充分,是策勒的这部学术巨著的一个鲜明特色,也是它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最重要的原因。

古希腊哲学的历史持续时间长达一千余年,研究者通常将它分成三个时期,即前苏格拉底哲学、古典希腊哲学、晚期希腊哲学。人们已经十分熟悉这一历史分期,但它成为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基本学科规范。但是,上述历史分期正是由策勒在他的这部巨著中奠定的,而在此之前,古希腊哲学研究诚然不是按照这一模式进行,对此我们只要看看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将古希腊哲学研究的第一个时期划分到亚里士多德就可以明白了。实际上,正是策勒在他的研究中明确树立了苏格拉底在古希腊哲学史中的枢纽地位。对此,A.A.朗这样写道:“尽管第尔逊似乎是第一位写了一部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出现在其标题中的人,但这个术语所表达的概念在爱德华·策勒伟大的《古希腊哲学史》中却是明确的,它强烈地影响了第尔逊,就像它迄今已经影响了所有人一样。”

古希腊哲学史的研究著作迄今已经积累了相当的规模和数量,但是,其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针对哲学家个人书写的,但能够反映哲学家活动于其中的哲学学派,对学派史做一梳理和研究的,可谓寥寥。而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在这方面为后世学者提供了十分丰富的材料,构成了他这部巨著最具特色的学术价值之一。以六卷八册的中文版为例,其第二卷不仅研究了苏格拉底,还研究了所谓的“苏格拉底学派”;其第三卷不仅研究了柏拉图,还研究了由第一代柏拉图主义者所构成的“老学园”;其第三卷不仅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还研究了早期漫步学派。这些方面的思想资料在市面上通行的古希腊哲学史

哲学史编纂的耀眼星座



《古希腊哲学史》 爱德华·策勒著 聂敏里主编 人民出版社

著作中基本上是阙如的,而策勒的研究显然能够弥补学术研究的这一欠缺。

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享誉国际学术界已逾百年,迄今为止已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但在近期推出其中文版之前,仅有翁绍军先生所译《古希腊哲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该书是策勒给学生写的一本辅导教材和入门书,对于我们了解《古希腊哲学史》这部巨著的全貌只有杯水之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汪子嵩先生在计划主编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多卷本《希腊哲学史》之前,曾有将策勒的这套《古希腊哲学史》翻译过来的打算。2016年,时年已94岁的他过世前专门处于翻译最后阶段的汉译本课题:“德国哲学史家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是古希腊哲学学科的奠基之作,中国学者有责任将它完整地翻译过来!”而在汉译本整体完成之际,国内哲学界几位重量级的前辈学者也都先后题词。姚介厚先生的题词是:“策勒的六卷本《古希腊哲学史》是现代以来从事古希腊哲学研究的学者必须从之开始的起点之作。”陈村富先生的题词是:“策勒的六卷本《古希腊哲学史》既有独到的见解,又有详尽而可靠的史料注释,甚至注释超过正文。初学者,重正文;研究者,重注释。它有导读的功能,更有激发后人理论思维的作用。”赵敦华先生的题词是:“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经过百年考验,成为古希腊哲学研究的现代经典,中译本难度极大。这套高水平中译著作的出版,对提升汉语学术界关于希腊哲学和文化的教学和学术水平,有重大推动功效。”由此可见老一辈学者对将策勒这套书翻译成中文的殷殷期待,以及对它在国内古希腊哲学史学科建设上重要意义的深刻认识。

策勒这套书篇幅巨大,涉及的哲学家和学派众多,六卷八册的体量本身就令人敬畏。同时,作为学术专著,它反映了直到十九世纪末为止德国学者在古希腊哲学研究上所取得的主要学术成果,全书遍布对一手原文文献和二手研究文献进行深度学术讨论的学术性脚注。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要求翻译者不仅对古希腊哲学具有充分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

现在由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这套书的汉译本,是由我担任主编的翻译团队从2010年开始以10年之功完成的。10年的漫长、艰辛岁月,倾注了译者和编辑的大量心血,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向学界呈现一部经得起时间和学术严格检验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基本学术经典。现在,当这部学术分量厚重、翻译质量上乘、装帧设计精美的学术巨著由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对于深化中西文明互鉴,繁荣和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推动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向着更深层次推进,一定会起到积极而巨大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唐代书手研究》 周侃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